

中国共产党简史学习提纲(初稿)

(四)

中國共產黨簡史學習提綱(初稿)

(四)

——初級組學習參考材料
“學習導報”編輯室編

第四章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 (一九三七年—一九四五年)

第一節 抗日戰爭的爆發。解放區戰場的開闢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四〇年十二月)

一、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的國際形勢。

一九三七年，各資本主義國家還沒有把一九二九年爆發的經濟危機的創傷醫好，又陷入了新的經濟危機之中，這就使得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更加緊張起來，因此，各帝國主義國家用軍事行動來重新分割世界的鬥爭更加尖銳化了。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對中國的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德國強佔了奧地利和捷克，意大利吞併了阿比西尼亞，並和德國一起在西班牙建立了法西斯政權。到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國進攻波蘭，接着英法對德開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了。

這個戰爭，一開始是帝國主義反對民族解放運動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爭還沒有成爲普遍的各國，從多方面損害美却實行

所謂“不干涉”政策，拒絕集體安全制度，甚至給侵略者以各種幫助。這是因為英、法、美雖然反對德、意、日損害他們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又畏懼蘇聯社會主義的壯大和發展，害怕歐洲工人運動和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認為法西斯主義是抵禦世界革命的有力工具，因而採取了“坐山觀虎鬥”的政策，他們力圖把希特勒德國所發動的侵略戰爭的火頭，燒到蘇聯身上去，使蘇德在戰爭中互相削弱，然後他們便可從中漁利了。這些“不干涉”政策者所玩弄的危險的政治把戲，結果是“搬起石頭打了自己的腳”。

在這個時候，只有蘇聯是不知道經濟危機為何物的國家，是為保持全世界的和平而鬥爭的國家。蘇聯在一九三七年底，工業達到了一九二九年水平的百分之四二八。全部工業產品中，社會主義成分佔百分之九九點九七。農業集體化也獲得了偉大成就，集體農莊在一九三七年間所包括的農戶，佔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九三。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獲得了鞏固的發展。

蘇聯密切地注視着國際間的險惡事變，於是蘇聯就來為保持全世界的和平而鬥爭。蘇聯一方面堅決地實行維護和平的政策，不斷揭露帝國主義的罪惡的戰爭陰謀，採取主動的靈活的外交政策，鞏固和其他各國的商務聯系，保持和鄰近國家的和平關係，援助遭受侵略而為本國獨立奮鬥的民族；另一方面又竭力鞏固國防，加強軍隊的戰鬥力量，準備來粉碎胆敢侵犯蘇聯的敵人。

在這種國際環境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蘇聯和愛好自由的各國人民反對侵略戰爭的目的，是要消滅法西斯主義，維護各國人民的持久和平。而美、英、法帝國主義所抱的目的，則是要削弱蘇聯，並且把德、意、日帝國主義逐出世界市場，以達到他們自

已獨霸世界的目的。

中國的抗日戰爭，就是在這種複雜的國際環境中開始的，因此抗日戰爭爆發後，國際間就存在三種力量：第一是日本和它的盟國德、意。日本帝國主義是兇惡的侵略者，它企圖滅亡中國，並一再向蘇聯挑釁，企圖以此來引誘英、美帝國主義對它讓步。第二是蘇聯。蘇聯是我們最忠誠的朋友，蘇聯堅決地執行着支援中國抗戰的政策，因此，在一九三七年八月與中國訂立了互不侵犯條約，並給中國以財政上軍事上的援助。第三是英、美。英、美帝國主義不願意日本奪取他們在東方的利益，因而願意中國抵抗日本的進攻，但是他們一則希望把戰爭引向蘇聯以便坐觀成敗，二則害怕中國人民的力量在戰爭中強大起來，危害他們的利益，三則忙於對付西方希特勒所引起的緊張局勢，害怕日本在東方對他們實行攻擊，所以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它們總是力求與日本妥協，或者希望中日兩敗俱傷，他們就可坐收“漁人之利”。針對英、美這種反革命的兩面政策，中國人民就必須對他們實行革命的兩面政策，即一方面聯合他們共同反對日本的侵略，另一方面警惕和反對他們危害中國人民的陰謀。

二、抗日戰爭的爆發。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綫和國民黨軍隊的大潰敗。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綫和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的開展。抗日根據地的開闢。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軍向駐防北京以南的蘆溝橋地方的中國守軍進攻，八月十三日又攻擊上海，中國守軍在中國人民抗日高潮的影響下，違反國民黨統治集團的意志，奮起抵抗，全國進入了抗日戰爭。

蘆溝橋事變的第二天，我黨即向全國發出宣言，號召各黨各派各階層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經過我黨的努力，與國民黨政府協議，中國紅軍及其在南方各省的游擊隊，先後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開向華北和華東前綫參加抗日戰爭。九月二十二日，國民黨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還在七月十五日就已交付國民黨為宣佈國共兩黨合作成立的宣言，隨後蔣介石在二十三日又發表了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的談話。於是，便宣告了國共兩黨統一戰綫的成立。這個統一戰綫，把中國帶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抗日戰爭爆發了，但是並不是所有一切國內的力量都是完全一致抗日的，當時國內存在着人民、國民黨和漢奸三種不同的力量。人民是堅決反對日寇的，因為日寇的野蠻侵略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生死存亡的問題。工人階級是抗戰的領導者，並與抗戰的主力軍——農民階級結成鞏固聯盟，組成了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以及由地主階級分化出來的開明士紳的統一戰綫。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抗日統一戰綫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黨領導下的人民武裝力量是抗日戰爭的中心支柱。

漢奸是堅決依附日本，幫助日本侵略和壓迫中國人民的。充當漢奸的是最反動的一部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其他敗類，這是由於他們的階級本質所決定的，也是由於日本的大力收買和國民黨的長期的反動政策所造成的結果。全國人民對於漢奸是切齒痛恨和一致反對的。

國民黨是由一個複雜成分組成的政黨。而其主體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蔣介石集團。他們曾經堅決地反對人民，並決心要消滅共產黨，蔣介石這時的抗日表現，只是由於：第一、人

民對他們的壓迫，如果他不表示抗日，就不能維持他自己的統治；第二、日寇對中國的進攻已直接危害着他的政權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第三、英、美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有矛盾，英、美希望中國和日本打着，拖住日本。所有這些原因，就使得蔣介石集團在抗日戰爭中表現了反革命的兩面性：一方面他也表示要抗日，並希望能夠速勝；另一方面他又不堅決抗日，始終沒有割斷與日本侵略者的聯系，準備一有機會就要妥協，同時他又反對人民抗日，特別反對共產黨抗日，他要包辦抗日領導，限制人民特別是共產黨力量的發展，並陰謀保存和聚積自己的武力消滅共產黨和人民的力量。這樣，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既要與蔣介石進行一定的聯合，以推動蔣介石部下的軍隊抗日，又要與蔣介石的反動政策進行堅決的鬥爭，以保衛人民的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

在這種複雜的政治形勢下，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中國的抗日戰爭一開始就存在着兩條根本不同的指導路綫。一條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路綫，另一條是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路綫。貫串於整個抗日戰爭中的兩條路綫的鬥爭，乃是抗日戰爭中一切問題的關鍵所在。

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路綫，是壓迫人民不要人民參加只要國民黨政府抗戰的“片面抗戰”路綫。其辦法是壓迫人民，不給人民以抗日的民主自由，繼續殘酷地壓榨人民；繼續保持其軍閥制度，壓制愛國軍隊的積極性，實行單純防禦的消極作戰方針；繼續保持反動的專制統治，進行亡國奴教育，包庇漢奸賣國賊，破壞民族團結。在這種“片面抗戰”的路綫的指導下，就出現了國民黨軍隊的大潰敗。在短期間內（從七七

事變到一九三八年冬)喪失了華北、華中大片土地。

另一方面，是以中國共產黨爲代表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路綫，即“全面抗戰”的路綫。其辦法是實行全國人民總動員，保障抗日自由，武裝人民，發動抗日游擊戰爭，改善軍隊的政治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實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特別是實行減租減息；實行抗日教育政策；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堅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實行“全面抗戰”的結果，發動了敵後的廣大人民羣衆和抗日游擊戰爭，收復了廣大的爲國民黨軍隊所失去的國土，先後創立了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山東、華中、華南等抗日民主根據地，爲徹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創造了重要條件。

三、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黨中央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綫對以王明爲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傾向的鬥爭。

抗日戰爭中兩條路綫的鬥爭，在黨內也有了深刻的反映，黨內出現了投降主義。在毛澤東同志發表了關於“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提綱之後，以王明同志爲代表的黨內投降主義者，站在右傾機會主義的立場，在下列主要問題上與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綫相違抗。

第一、右傾機會主義者抹煞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中的階級區別，抹煞了蔣介石國民黨與我黨在抗日問題上的反人民路綫和人民路綫的區別。

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內部存在着左、中、右三個不同的階級集團：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進步力量爲左翼，中間集團是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右翼集

團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黨的任務就是要擴大與鞏固左翼集團，爭取中間集團的進步與轉變，孤立右翼集團。同時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指出，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抗戰主張，存在着原則的分歧。而右傾機會主義者否認了這一切，甚至否認了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階級區別，認為兩黨都是“中國一大部分優秀進步青年的總匯”，並硬說國民黨內沒有什麼法西斯派，這種錯誤意見，實際上是引導人民去適合蔣介石國民黨的反人民路線。

第二、右傾機會主義者否認統一戰綫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否認“有團結有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革命方針，主張一切經過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和採取“一切聯合，否認鬥爭”的錯誤方針。

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指出：必須在統一戰綫中保持我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是在實行一定的綱領，即我黨所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的基礎上的統一戰綫，不是無原則的統一和合作。“因此，‘統一戰綫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的說明、實踐和堅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引向勝利之途的中心一環。”^①同時，在抗日戰爭中，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是一致的。但是由於統一戰綫包括了各個不同階級、黨派和政治集團，他們彼此間的矛盾和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必須在階級鬥爭服從民族鬥爭的原則下，停止那些不利於團結抗日的鬥爭，開展那些有利於團結抗日的鬥爭。這就是實行統一戰綫中“有團結有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方針。右傾機會主義者反對這些革命的方針，主張“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一切聯合，否認鬥爭”，要求共產黨對蔣介石國民黨作無原則的

① 毛澤東：“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一版，三五五面）

讓步，要求八路軍新四軍完全統一於國民黨軍隊，作繭自縛，任令蔣介石來消滅我黨，這是十分危險的錯誤方針。

第三、右傾機會主義者輕視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爭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幻想依靠國民黨軍隊來求得速勝。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認為：必須依靠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和人民的力量，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正確的戰略方針應該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基本的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必須發動人民武裝，建立抗日根據地。右傾機會主義者不相信人民的力量，把抗戰勝利的希望寄託於國民黨的“正規戰爭”，誇大了國民黨統治區合法運動的作用，誇大了城市和國民黨軍隊的作用。

第四、右傾機會主義者反對放手發動羣衆，反對在日本佔領區放手擴大解放區和擴大人民武裝，害怕這樣就要從抗日陣綫中“嚇跑了蔣介石國民黨”，甚至認為抗日戰爭勝利後，依然只能是最反動的蔣介石的繼續統治，而不能是人民的天下，這種論斷是非常有害和非常可恥的。

右傾機會主義路綫的根本錯誤，就是取消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權而把領導權送給國民黨。他們不相信人民的力量，因而，看到共產黨及其軍事力量的暫時弱小和國民黨的表面強大就錯誤地認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不能是人民的勝利，而只能是國民黨蔣介石的勝利。黨與這種錯誤路綫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因而使它在沒有發生更大危害的時候就在實際工作中糾正了。

四、毛澤東的“論持久戰”

一九三八年夏徐州失守前後，國民黨統治集團內亡國論與速勝論都很囂張。當時全國人民都渴望戰爭的勝利，但對於能否

勝利，如何爭取勝利却不清楚。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者也幻想依靠國民黨軍隊求得速勝。爲了澄清黨內外關於抗日戰爭的錯誤思想，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寫了“論持久戰”一書。

首先，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抗戰最後必然勝利，但戰爭必須是持久戰，而不能速勝。

毛澤東同志指出全部問題的根據在於中日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①從這一基本歷史特點出發，毛澤東同志分析了敵我之間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點。指出：日本是一個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而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弱國，這就決定了中國的不能速勝；但是，由於日本是垂死的帝國主義，它所發動的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非正義的，中國則正處於進步時代，有了已經覺悟和正在覺悟的人民，有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進行的戰爭是進步的、正義的戰爭；加上日本是小國及它在國際上的失道寡助，中國是大國，它在國際上是得道多助的，特別是蘇聯的援助，因此，戰爭的最後勝利必然是中國的。

毛澤東同志並指出了抗戰的持久性和中國之可能獲得最後勝利，將具體表現在三個階段之中。即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禦的階段，敵我戰略相持階段與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却階段，並指出了第二階段是整個戰爭轉變的樞紐。毛澤東同志對抗日戰爭的深刻分析，就徹底地駁斥了亡國論與速勝論的錯誤。

其次，毛澤東同志論證了進行持久戰，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

^① 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一版，四〇九面）

必須採取人民戰爭的方針，他一再指出：“兵民是勝利之本”，因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衆之中。”^①而為了發動全軍全民的積極性，必須反覆宣傳抗戰的目的，實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實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的軍隊政治工作。毛澤東同志還正確地規定了在持久戰的一般方針之下，實行“防禦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綫中的外綫”的具體方針。

毛澤東同志着重指出了抗日游擊戰的戰略意義。認為：雖然整個戰爭中，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是輔助的，但游擊戰在整個抗日戰爭中有重要的戰略地位，他不單輔助正規戰，還將在殘酷的戰爭中間，把自己也變為正規戰。這樣，毛澤東同志就規定了依靠人民羣衆的人民戰爭的路綫及其戰略戰術，反對了蔣介石的“片面抗戰”路綫及其單純防禦的戰略戰術，批判了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者輕視游擊戰爭，把抗戰勝利的希望寄託於國民黨軍隊的“正規戰爭”的錯誤思想。

“論持久戰”一書是中國人民戰勝日寇的重要理論武器，是對馬列主義軍事理論上的傑出貢獻。

五、中國共產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的“統一戰綫中的獨立自主問題”和黨內右傾機會主義的克服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國共產黨在延安舉行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會議批准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政治局對於抗日戰爭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路綫，批判了那種把抗日戰爭的勝利寄託於國民黨軍隊，把人民的命運寄託於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合法運動的錯誤思想。

① 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一版，四七四面）

毛澤東同志在全會上作了“統一戰綫中的獨立自主問題”和“戰爭和戰略”問題的報告，號召全黨認真負起我黨領導抗日戰爭的重大歷史責任，強調了統一戰綫中保持無產階級獨立自主原則的重要性，批判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綫”的錯誤，說明了戰爭和戰略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首要地位，從而取得了全黨在領導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一致。

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是一個很重要的會議，它批判了黨內右傾機會主義的偏向，確定了黨在當時抗戰的基本方針。

六、武漢失守後解放區戰場成爲抗日戰爭的主要戰場。

蔣介石的消極抗戰和積極反共反人民。

蔣介石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的錯誤領導，使得國民黨軍隊迅速潰退，到一九三八年十月，就不得不退出武漢和廣州。但是由於我黨的正確領導，敵後游擊戰爭的巨大發展，使日本侵略者的後方暴露在強大的游擊隊的攻擊下，因而不能再繼續前進。這時，日寇才認識到，抵抗他們的野蠻侵略的勁敵，不是國民黨而是共產黨，他們開始改變政策，決定把主要的壓力放在解放區，而以政治誘降爲主、以軍事打擊爲輔的政策去對付國民黨。於是他們開始了殘酷地“掃蕩”我各個敵後抗日根據地。抗日戰爭轉入了相持階段。

面對人民力量在抗日戰爭中的迅速發展，日本的誘降和英美的勸降（因爲英、美帝國主義此時正急於準備對德戰爭，力求與日本妥協），國民黨大資產階級親日派汪精衛集團公開投敵了。從這時起，蔣介石國民黨也就採取了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政策。他一方面把軍隊主力集中在以重慶和西安爲中心的地區，

保存實力，而把作戰的重担放在解放區戰場上，讓日寇大舉進攻解放區。

另一方面，他加強了對日妥協投降的活動，而爲了投降，就必須加緊反共。一九三九年初蔣介石國民黨頒佈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共黨問題處理辦法”、“淪陷區防範共黨活動辦法”等反動文件，日益強化其法西斯統治，加強對我黨的政治壓迫和軍事進攻，於是蔣介石集團的投降可能成了當時政治形勢中的主要危險。

針對這種嚴重的政治形勢，我黨中央於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發表了宣言，提出以“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口號。隨後，毛澤東同志又代表我黨提出了反對國民黨反共磨擦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嚴正自衛原則，領導解放區軍民和全國人民與蔣介石的反動趨勢作鬥爭。

七、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目前抗日統一戰綫中的策略問題”。

武漢失守到一九四〇年初，蔣介石國民黨爲了配合其政治上軍事上對我黨的進攻，又重新彈起了資產階級專政的濫調。民族資產階級雖不滿蔣介石集團，但也存在着妄圖在抗戰勝利後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反動夢想，全國人民在國民黨反動派所製造的那種濃厚的妥協投降的空氣下，對中國的前途極爲擔心。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雖已基本克服，但其在中國革命基本問題上的錯誤觀點尚未徹底清算。所有這些，迫切要求中國共產黨向全國人民說明自己對中國革命和對新中國建設的全部見解，以便

給予工人階級以及全國革命人民以明確的鬥爭指針。於是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〇年一月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這一關於中國革命的完整的馬列主義著作。

毛澤東同志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學說和中國的歷史特點以及中國革命的長期鬥爭經驗，全面地深刻地論證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並具體地製定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綱領，其要點如下：

(一) 毛澤東同志認為：在俄國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毛澤東同志指出：“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①這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因此“在這種時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了反對帝國主義，即反對國際資產階級、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屬於新的範疇了；它就不再是舊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②根據這一根本的分析，得出一個極端明確的結論：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國革命這一最基本的特點，乃是毛澤東同志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基本出發點。

(二) 毛澤東同志認為：在俄國偉大的十月革命以後，在五四

①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一版，六三八面）

② 同上書，六三九面

運動以後，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已經屬於中國工人階級了。

毛澤東同志指出：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和徹底反對封建勢力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只能由工人階級領導才能取得勝利，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工人階級已經領導了這個革命運動。毛澤東同志系統地論述了工人階級領導權問題是中國革命成敗的關鍵，從而粉碎了資產階級企圖排斥工人階級領導的反動夢想，也從根本上批判了企圖使工人階級追隨資產階級的黨內右傾機會主義。

(三)毛澤東同志認為：中國革命運動包括了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堅決領導民主主義革命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

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①毛澤東同志深刻地闡明了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和聯系，指出了“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在這兩個革命階段之間，“不容橫隔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而必須互相銜接。這樣，毛澤東同志既粉碎了資產階級企圖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完全的夢囈”，也駁斥了“左”傾空談主義者企圖在民主革命中完成社會主義革命任務的空想。

(四)毛澤東同志具體地製定了一套完整的，既區別於資本主義又區別於社會主義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和文化綱領，為

①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一版，六三七面）

新中國的建設規劃了一個模型，粉碎了關於中國發展前途的各種反動的、錯誤的論調。

毛澤東同志這一偉大的戰鬥的著作，給中國人民革命指出了明確的前途，生動的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了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因而它極大地幫助了黨內的思想統一和全國人民的思想統一，極大地幫助了全國各解放區的政策統一。這一著作，對於中國人民的解放鬥爭與建設新中國，起了極大的動員與組織作用，因而極大地加強了中國革命。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黨的高級幹部會上作了“目前抗日統一戰綫中的策略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是針對我黨在擊退蔣介石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時，黨內開始發生的一種過“左”的偏向而作的。當時由於國民黨的軍事進攻和我們不得不進行自衛鬥爭的情況，黨內一部分同志對時局作了錯誤的估計，認為國共合作已經破裂或快要破裂，認為黨的政策已不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而是像十年內戰時那樣的土地政策，因而過分地打擊了地主和不注意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士紳，不了解在國民黨不投降日寇的條件下，保持與國民黨不破裂是必要和可能的，爲了繼續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綫，黨規定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總方針，和在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中“有理、有利、有節”的指導原則，並在所有解放區政權中實行三三制的政策。

(一)毛澤東同志指出：發展進步勢力，就是發展無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力量，就是不受國民黨的限制，獨立自主放手擴大八路軍和新四軍，廣泛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建立我黨所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綫的政權；就是發展黨的組織到全國；就是發

展全國民衆運動和爭取全國的知識分子。

(二)毛澤東同志指出：爭取中間勢力，在當時就是爭取民族資產階級、開明士紳和地方實力派，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有矛盾，但他們贊成抗日，贊成憲政運動，開明士紳是地主階級的左翼，他們雖和農民有階級矛盾，但他們不贊成頑固派，地方實力派的領導成分多屬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因而和進步勢力有矛盾，但他們和國民黨中央勢力亦有矛盾，中間勢力的共同點是都想利用進步派和頑固派的矛盾以達其政治上的目的。

中間勢力的特點是他們的動搖態度，並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分化，對於他們只能當作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同盟者去爭取。

(三)孤立頑固勢力，就是孤立大資產階級。頑固派當時依然採取兩面政策。一面還在主張團結抗日，一面又執行極端的反動政策，摧殘進步，作為準備投降的步驟。因此，我們必須以鬥爭求團結的革命的兩面政策，來對付頑固派。在抗日統一戰綫時期中，同頑固派的鬥爭，不僅是為了防禦他們的進攻，以便保護和發展進步勢力，同時是為了延長頑固派抗日的時間，並保持我們和他們的合作，避免大內戰的發生，所以，同頑固派鬥爭，是團結一切抗日力量，爭取時局好轉，避免大規模內戰的不可缺少的手段。但在抗日統一戰綫時期，和頑固派作鬥爭，必須注意“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有理”就是自衛的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利”就是勝利的原則，不鬥則已，鬥則必勝，應利用頑固派的矛盾，擇其最反動者首先打擊之。“有節”就是休戰的原則，在一個時期內把頑固派打退後，在他們未舉行新的進攻前，應適可而止，實行休戰。

“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是不可分離